

#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

陈 恩 唐 健 温盛湘  
李 超 张江明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曾活跃着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爱国进步青年组成的队伍。这就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这支队伍从学生扩展到工人、农民，从城市走向农村，展开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散播到广东全省，为发展我们党的力量和扩大影响，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 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珠江也立即怒吼起来了。广州地区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和各界人民一起积极响应和声援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同时，北平等地的爱国青年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对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广东党组织经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历次严重破坏，地下党组织曾有一段时间停止活动，这时候正在重新建立。一九三五年秋，在上海党中央局发行科工作的王均予（王平）同志，受党的派遣，来到广州，组成“中国青年同盟”（一说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的革命青年组织，作为建党的准备。接着，北方局派去香港工作的薛尚实同志（孔志成）等组成的“南委”又派人来广州组织一个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突进社”（简称“突进”）。一九三六年五月，王均予到北方局，向刘少奇、李大章同志汇报工作。一九三七年党中央又派张文彬、张云逸等同志来广东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张文彬任省委书记。从北平调来广东的吴华（吴济生）同志负责省青委的工作，加

强青年运动的领导力量。

广东地下党通过“中青”和“突进”这两个进步的青年组织发动青年学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抗日活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山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发出通电，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十二日举行示威游行，决定停课一周开展抗日宣传。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中山大学、中大附中、广雅中学、执信、女师、女中、知用、教忠、仲元、庚戌、国民大学和民大附中等校学生，冲破重重封锁，召开全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推举中大曾振声（即曾生）为主席，决定以大会名义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会后，学生游行队伍到教育厅请愿，要求当局支持学生抗日活动。一月十三日，九百多学生又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派公安局长和特侦队长带领一百多名特务、流氓，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旗号，混入游行队伍。到了荔湾桥，他们拔出凶器，殴打学生，打伤一百多人，绑走受伤学生十多人，中大学生朱文畅惨遭杀害，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湾惨案”。这一暴行，激起了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从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广东地下党还在许多学校成立秘密读书会，利用合法的形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广州市民众歌咏团”、“艺术工作者协会”、“时事研究会”、“蓝白剧社”、“锋社”以及地下学联等进步群众组织，宣传抗日。其中歌咏团和艺协参加的人数较多，工作开展比较活跃，起过较大的作用。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后来大都参加抗先并成为骨干力量。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广东的政治局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和行动,表面上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但他们的出发点则是为了向群众标榜抗日,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控制学生运动,出面成立学生抗敌御侮救亡会、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等。

由于广东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已初步扎根,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又建立了一批秘密的或公开的群众团体,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党组织决定,一方面派出一批党员和“中青”、“突进”成员,并且动员一批进步群众,参加上述由国民党当局成立的组织(实际上由我们党所掌握);另一方面在我们党组织比较强的学校首先成立抗先,如中大抗先、中大附中抗先、广雅中学抗先、教忠中学抗先等。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广东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高涨,我们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全省青年运动统一起来,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以适应全国和全省抗日战争的需要。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

抗先的成立是分两步进行的。省青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首先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以“中青”、“突进”为核心,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联合各个学生青年团体,发动举行“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的示威游行,并产生联合全市学生的筹备会,初步把广州的在校青年统一组织起来。接着,省青委又根据南京失守后,华南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决定尽快把统一和武装青年的工作,扩大到全省。于是以中大抗先、中大附中抗先为基础,联合市学抗会、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青年抗日先锋队、平津同学会、留东抗敌后援会等一共八个单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发起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接着,又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

这时,中共长江局再派于光远同志来广州,传达成立“民先”的指示(当时在广州也有民先等委),广东省委认为华北地区我党领导的“民先”已经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而广东的抗先已经成立,在青年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并且已经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有利于发展青年运动,因而决定仍保留“抗先”,不作改变。于光远也留下来,

参加省青委的领导工作。

抗先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于二月三日正式成立。当时广东国民党的党、政、军当局和各界都有负责人应邀出席,对抗先表示祝贺和支持。八路军驻广东办事处的云广英同志,还向同学们讲述了游击战的原理。会后,同学们怀着极大的兴趣举行了第一次游击战斗的演习。

抗先在其《发起宣言》中,明确阐明自己的工作任务:“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英勇的青年战士到抗战的旗帜下来,加强我们本身的组织,武装我们的队伍,充实我们的救亡理论和技能,适当分配我们的工作,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有计划的分布到大小县市乡村去动员工农群众,武装工农群众,保卫大广东,支持全国抗战的顺利开展,保证抗战最后胜利的获得。”关于抗先的性质,队章亦明确规定:“本队是一个广泛的、综合的、统一的青年团体,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权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

为了把抗先建设成为一支有较高政治觉悟、有战斗力的队伍,中共广东省委十分注重在抗先中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在抗先的临时工委、总队部和各级抗先队伍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加强党对抗先的领导。省委还强调要抓好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举办读书班等形式,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习社会科学,吸引青年们参加集体活动,培养他们关心国内外大事的兴趣和习惯。抗先临时工委出版了《先锋队报》,翻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战略与策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以及《红色文献》等,供队员们学习和研究。不少人就是在如饥似渴的学习当中,寻找到了真理,从爱国主义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并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抗先还积极组织队员们学习军事,邀请从前线归来的将士给大家作讲演。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八路军驻广东办事处的同志主讲的军事课和政治工作课。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虽少,武器虽劣,却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并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两相对比,人们加深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景仰和信赖。有一次,叶剑英同志因事路

经广州,应邀到中山大学作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前来听讲演的人十分踊跃。叶剑英深入透辟的分析,象磁铁一样吸引着青年人的心。还有一次廖承志同志应中大学生的邀请,在中大大钟楼所作的政治时事报告,也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这些年青的队员们,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都怀着一个心愿:到前线去,到敌后去,拿起武器,消灭侵略者。

在组织军事学习的同时,抗先临工委还有计划地举行军事演习,进行军事操练。当日本飞机对广州疯狂轰炸时,抗先队员勇敢地到街头担任防空工作,帮助市民迅速疏散;空炸过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救护工作;晚上日机夜袭时,参加巡查,捉拿汉奸。抗先队员这些活动,受到市民的称赞。

抗先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抗先有不少文艺人才,他们组织抗敌演剧队,经常在街头演出,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歌》和其他一些既有抗日内容又有地方特色的小话剧、戏曲等。此外,还开展募捐献金等活动。一九三八年的“八·一三”献金运动很有成效。当时设在西濠口的献金台,有一天,专为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献金,献金大会有一千五百多群众参加,并自发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但却把许多年来人们受白色恐怖压迫的闷气都打破了,使得广大群众知道,十年来广东的共产党并没有被消灭。

## 到工厂去、到农村去、 到抗战的前线去

抗先成立之初,就注意组织力量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抗日的前线去,发动群众,引导青年学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抗先成立之后,便着手同广州的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当时的一些主要工会如协同和工会、榨油工会、机器工会等,抗先都曾派出专人去开展工作。并通过举办工人识字班、歌咏队以及同工人共同劳动、交谈,向他们传播抗日和革命的道理,同时也从工人群众当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有一份报告,虽然只是记的中大抗先第一特别队的情况,却是有代表性——

“我们在区指导部附近的工厂里,建立起‘初步的’‘脆弱的’工人运动基础来。如国华胶厂、

大中华胶厂,都经过我们同志的不断努力。每天的胶厂里,机器部、贴胶部、裁缝部,甚至火炉旁,都有我们同志‘钻’进去和工友们谈话。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一些接触工人的经验,我们认识了很多‘头脑简单’或‘粗鲁’的有血有肉有骨骼的同志,他们豪放直率。过去只在梦里想着大革命时候工人的伟大,但不能晓得今昔的不同。这不同有使人浩叹,也使人兴奋吧!”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撤出广州之前,抗先临时工作委员会曾于寒暑假期间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去开展活动。寒假主要是由中山大学的党员和陈秋容(周锦照)、周华衍等同志带一个特别支队到广州市郊的土华乡、长湴乡,由教忠中学党支部书记张铭勋(张江明)和支委李静筠、李琼英(胡明)等同志带一个特别支队到顺德县的西海、路尾围。暑假则派出三十二个工作队共五百多人,分散到省内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宝安、中山、台山、开平、增城、博罗、从化、花县等二十个县去工作。队员们和当地的农民群众住在一起,利用晚上和其他农闲的时候,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和艺术宣传,有时还到田头,帮助农民做一些轻微的劳动。教忠中学的抗先在顺德县工作时,还帮助贫苦农民为改善经济地位而斗争。他们还在那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农村党支部和抗先组织。西海和路尾围后来成为珠江纵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经过抗先队员努力工作,中山、花县、增城、东莞、郁南、新会、江门、台山、开平、云浮等县都成立了抗先分队。至于工作开展较早的广州市郊如黄埔地区,还成立了自卫团、农民剧社、儿童团、救护队、妇女识字班等;此外还成立了乡村知识分子的组织(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以及乡村儿童组织(十三乡儿童团)。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自愿卖物献金,支援抗战。当广州沦陷时,土华乡有三十多位青年农民带了武器来找抗先,要求一道去打游击。

一九三八年五月,抗先根据省委的指示,派出工作组前往增城,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当广州形势危急的时候,抗先动员了七十多名干部和队员,于十月二十日开赴东江前线,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他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例如护干班的同志,向东江进发时,在增城朱村陷入了敌人的包围,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但仍然毫不迟疑地与工兵团的士兵们并

肩作战，用步枪、机关枪同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中队长梁国权英勇阵亡，四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先的斗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 揭开斗争的新一页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日帝侵略军向华南发动全面进攻。淡水、惠阳相继失陷。广州形势危急。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抗先临时工委于十四日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把抗先的原有组织变为战时组织，将工委会转变为指挥部，号召青年参加战时工作队，以及广泛动员民众，保卫广州，保卫华南。可是，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触即溃，以致数天之内，日寇已迫近广州城下。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准备弃城逃跑，民众也纷纷逃亡。在这种情况下，抗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保存干部，撤离广州，分散各地，开展党的工作与青运工作的指示，在三天内集中了六百多名队员和青年干部进行学习和整顿。其中中共党员占全队总人数将近百分之四十，基本上包括了抗先的骨干力量。

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敌人的坦克开始冲入广州，国民党广东政府的机关人员早已逃走一空。抗先大队部临时弄到两挺轻机枪、七枝驳壳和几支步枪，遂决定于凌晨三时，在夜色的掩护下向西江方向撤退，经过五天五夜的行军，于二十五日抵达四会县城。

此外，救亡呼声佛山分社组织了当地青年、手工业工人和未能随大队撤退的抗先队员共三百多人于二十二日晚退出佛山后，已于二十四日抵达四会马房，翌日到达广宁县城，并且公开打出抗先的名义，驻扎下来。

关于此次西撤，抗先党支部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不是为着逃难，而是为着抗日。还在广州的时候，抗先为了获得合法的地位，名义上属于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广东民众战时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到达四会后，动委会却要求取消抗先的组织。我们识破这是国民党广东当局瓦解抗先的阴谋，坚决不同意。当时省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秘密随同抗先一起撤退到四会。抗先党组织经过请示，决定可以同意挂战时工作队的招牌，由国民党当局供给每人每月六块钱的生活费，但抗

先的组织不能取消，而且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列举了抗先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深得广大青年拥护，在群众中很有基础的事实，向动委会据理力争，迫使他们同意我们的处置办法。这样，抗先就挂了两块招牌。十月二十七日，抗先在四会附城的凤凰村召开了队员大会，队员们满怀战斗激情唱起了抗先队歌(注)：

我们是英勇的抗日先锋队，  
我们是一支铁的队伍，  
我们不怕敌人的残暴，  
也不怕艰难和痛苦……

雄壮有力的歌声，激荡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在热烈的气氛中，大会通过了抗先队部的工作报告以及抗先的章程。并选出委员二十三人，组成总队部。这二十三名委员是邓明达（总队长）、梁良嘉（梁嘉、副总队长）、陈恩（副总队长）、黄泽成（组织部长）、陈能兴（宣传部长）、余铭艳（秘书长）、李鹤超（李超、组织部副部长）、朱醒良（朱荣、宣传部副部长）、唐健、区白霜（梦觉）、王磊、黎民伟、何濂、温盛湘、陈中夫、宋之光、梁威林、林彩容、刘凤岐、吴华（济生）、谭家驹、林耀鹭、刘汝琛。此外，还决定加紧建立各级地方队部和开展武装工作。

根据省委指示，这支队伍除留下二百多人在西江各县外，其余的则转到韶关地区各县工作。

当时，从广州撤出来的还有“四政大”和“学生军训队”两支队伍。“四政大”全称为“第四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原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余汉谋（第四路军总司令）、李熙寰（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为标榜抗日于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成立的。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为了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以及帮助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治工作，改造国民党军队，决定派我党党员和动员抗先队员秘密考入“四政大”。当时招收的六十名队员中，大部分是抗先队员，其中党员有十二人，事先曾由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尹林平同志直接进行谈话。他们进入“四政大”后，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由李静筠任支部书记，按照省委的指示开展工作。

“广东省高中以上学生军事训练队”，是一九三八年暑假，广东国民党省政府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和巩固自身的地位而举办的。当时宣布：凡是高中以上学生都要参加，不参加的便不能毕业，参加过学生军训结业的可作为预备

役候补军官,应征参军后可得到准尉或少尉待遇。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日,改造国民党的军队,决定派在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动员“抗先”队员参加学生军训队,以便宣传党的主张,团结群众,并争取有一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国民党的下级军官,直接掌握武装力量。在军训队中建立了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一百多人,抗先队员也有二、三百人(包括在军训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抗先队员)。军训队党组织直接由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地下)。三个支部的具体工作由省青委书记吴华直接领导。广州沦陷时,这两支队伍也撤了出来。“四政大”撤退到韶关,学生军训队则撤退到连县,在我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军训结束后,国民党省政府开办“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地干所”),宣称要改革地方行政,任用青年,推行地方自治;毕业后,大学生可任区长,高中生可任乡长。经向中共广东省委请示,为了争取广东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日,协助进行地方改革,尤其是以便能控制和掌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领导上决定除个别党员因工作需要调出之外,其他党员和抗先队员都打入“地干所”。在“地干所”中仍然分为三个党支部,建立一个党总支,也是由吴华直接联系和领导。

## 把抗战的火种撒向全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抗先”总队部在新兴县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总结总队部成立二个月来的工作,确定今后抗先总方针。会议通过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工作纲领(草案)》规定:(一)……坚持长期抗战、反对和平妥协,巩固团结、反对分裂,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二)积极动员民众、武装民众,参加自卫团、游击队。(三)到战区去,到前线去,到沦陷区去,积极进行民众动员,组织武装斗争,直接打击日寇,摧毁汉奸政权。(四)动员青年参加战时工作,参加军事训练,投考军事学校和各种军事、政治、技术训练班。(五)发动和建立民众的各种抗日自卫组织,协助原有民众团体使之健全充实,参加抗战工作。(六)发动并协助组织各地青年团体,建立全省青年统一组织,促进全国青年团结。(七)发展各地抗先组织,健全各地队部,加强和发展抗先队伍。大会

还号召全省青年与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保家卫国。会后,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南路等三十多个主要县份相继建立抗先县队部,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乡队部。从此,抗先的工作正式从城市走向广大农村,揭开了青年运动的新一页。

为了更便于取得党的领导,一九三九年三月,抗先总队部又随省委迁至韶关。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总队部在曲江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各地抗先负责同志以及山西民革社、岭东青抗、学联代表团、抗日青年前卫团代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在保卫华南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广东青年运动》与《为创造青年精诚团结切实参战的模范而奋斗》两个报告;听取了东、西、北江及中区的工作报告,详细总结了抗战发生以来青运工作经验,决定了今后整个青运的发展途径,指出:“我们要到战区去,到敌人后方去,深入农村,组织和武装广大的青年,并在工作上不断学习,不断创造,在战争中使广东青年运动更向前推进。”

抗先这支队伍逐步地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四万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中,有相当大部分是工农分子,而且也开始有了部分武器装备。随着抗先的影响日益扩大,参加抗先的团体和人员不断增多,抗先事实上已成为当时广东青年运动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抗先的活动从城市转到农村,直接担负着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任务,更加广泛地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到一九三九年五月,通过抗先组织建立起的妇女团体有七千多人,农民抗敌同志会和自卫团共五千多人;通过抗先开办的民校有五万多人。抗先的同志也是这些团体、组织的骨干,协助它们部署工作,克服困难,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使斗争互相配合,连成一片。

抗先除把各项活动继续推向前进之外,并开始建立革命武装。

中山县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当时地下党的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排长孙康同志。他以西樵小学校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中山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县委的领导下,抗先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三千多人;通过抗先去组织的妇女协会有两千多人。为了取得抗先的合法地位,便于独立开展活动,县委指示抗先除了做好下层群众工作之外,还

要注意做好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中山县长张惠长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将，与国民党右派有矛盾；四区区长是个爱国的归国华侨，在国民党县党部有点地位。抗先就主动接近他们，晓以大义，争取获得他们对抗先的支持。这里的归侨和侨属较多，而且大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抗先就积极在归侨中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支援抗战。此外，还组织演剧队经常在街头巷尾演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通过这些活动，党的威信在农民和归侨中不断提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后来中山县四、五、六区的抗日组织发展较好，一批一批的青年奔向抗日队伍，与这种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日军入侵中山之前，抗先发现有汉奸打信号与日军侦察机联络，马上召集队伍上山准备痛击日军的进犯。在横门、石岐诸役，抗先队员与其他地方武装一起同日军鏖战九昼夜，深得社会好评，国民党中山县当局也不得不给抗先队员通令嘉奖。一九四〇年春节前夕，日军从唐家湾登陆，占领中山。中共中山县委以抗先队员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独立大队，团结、发动抗日团体开展游击战争。后来，中山县的游击战争向平原和海面逐步开展。经过多次战火的磨炼，不少抗先同志成为抗日武装——珠江纵队和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骨干。

到增城县去的抗先同志，在配合党组织发展人民武装方面也做得较出色。增城在地理上属广州外围屏障。日军如从沿海地区登陆进而侵犯广州，必经增城。因此，在广州沦陷前，省委就指示抗先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前往增城，配合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东莞县委为了加强对抗先工作队的领导，也派出了一位在当地教书的党员参加抗先的活动。他们和仙村、瓦窑的地下党一起，很快建立了抗先乡队部和“妇救会”，举办民众夜校，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增城国民党当局在仙村也组织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第三区指挥部”。仙村地下党员阮海天同志担任了该团的政训员。由于地下党和抗先队的积极努力，这个团体始终与抗先保持着密切联系。日军在惠阳登陆的消息传到增城，抗先工作队和阮海天在自卫团里组织了一支武装常备队，抗先队支部另在瓦窑组织了一支武装常备队。这两支“常备队”和抗先工作队共有一百多人。共同团结起来，一起住宿，一起搞军事训练。当日本侵略者进犯广州，经过增城铁路线和东江河时，多次

遭到这两支武装常备队和群众的抗击。投入战斗的多达五百人。后来，这支队伍成为东莞游击大队的一个中队，阮海天同志任中队长。另外，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继续留在增城的抗先同志，则隐蔽在农民家里，组织游击小组，坚持地下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肖汉同志（云南人，北京朝阳大学学生）不幸为日军所俘，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高呼口号，壮烈牺牲，表现了革命者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增城人民至今还在深切怀念他。

其他地方抗先的武装队伍，在抗击日伪军队的战斗中，同样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与此同时，抗先中的党组织根据省委的指示，积极进行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使广东各地党组织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到东江去的抗先队，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对于推动当地救亡运动、建立河源党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广州失守前夜，中山大学学生和一些印刷工人、纺织女工共六十多人，在队长刘汝琛、副队长谭家驹（1941年9月在东莞战斗中牺牲）、林耀馨（后来参加海南琼崖游击队，光荣牺牲）率领下到东江工作。因日军从惠阳直扑东莞、增城、广州，他们只得迂回经北江沿铁路线到大坑口转翁源、连平，在路上走了两个月，长途跋涉两千八百余里，几经艰险，十二月才抵河源县。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了抗先总队部东江办事处（林耀馨为主任）和党组织中心支部，在农村也建立了一些乡队部。与此同时，党中心支部根据特委指示，在河源先后办了七八期青年训练班，并在训练班里秘密发展党员，在县城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在各地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河源县委。后来，东江办事处党的中心支部又扩大为党的河源中心县委，负责河源、新丰、龙门、和平的党的工作。此外，东江区队还帮助当地“惠青”发动群众，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建立了人民抗日游击队。

## 在斗争中走向新里程

为了在统一战线中扩大左翼集团，抗先坚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有的同盟者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甚至是靠不住的）以便联合起来同亲日派、大汉奸汪精卫及其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广州沦陷后，蒋介石乘余汉谋、李煦寰声誉扫地之机，派张发奎来广东接替余汉谋任四战区司令，夺了余的权。广东地方实力派因之与国民党中央有矛盾，李煦寰辞去了四战区政治部主任职务，就任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此“四政大”也与四战区脱离关系，成为十二集团军政治部政工大队。李煦寰等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有意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在翁源香泉水办了一个“政工总队”训练班。这时，国民党广东当局决定取消动委会政工队，停发经费，把所属战工队成员全部集中到韶关，准备解散。为了加强统一战线，改造旧军队，我党决定撤到韶关的同志可以参加“政工总队”训练班。参加香泉水集训班的青年队员八百多人（其中我地下党员有二百多人）。“四政大”的绝大多数党员也参加了集训班，许多人担任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集训期间，“政工总队”地下党组织设工委，下面各中队成立党支部，由省青委直接领导。

由于抗先的威信在民众中不断提高，余汉谋想加以利用，所以这时对抗先是有好感的。当时也有一些坏分子混了进去，他们在集训班里到处造谣生非，破坏团结，打击积极青年。抗先的同志决定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发动进步青年进行坚决的斗争，揭穿他们分裂革命、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从而巩固了进步青年的团结。一九三九年十月，“政工总队”集训班结束，学员被派到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所属军、师、旅、团政工队，从事抗日宣传和政治工作。

夏衍同志在《粤北之行》中讲到，“广东一年来要做而尚未做的民众动员的基础工作，他们却在短短时间之内愉快地做到了。广东局面能够很快地镇定下来，这近两千的青年功绩，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武汉、广州失陷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成长，由于日军侵略的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不能继续前进，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此时，日军的主要军事力量用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当局也在暗中与日本勾勾搭搭，进行妥协投降活动，并于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还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扼杀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日军为了巩固广州外围与进一步蚕食其他地区，正在向西江、中区一带发起攻势。国民党广东当局估计西江和中区可能很快会被日军占领，在沦陷区反共活动难以进行，便确定赶在西江、中区沦陷之前发动反共宣传，首先对抗先进行压制。于是派了刚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带来反共决议的国民党中统分子高信到西江、中区煽风点火，并撤换西江各县中一些稍为支持抗先活动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同时对广宁的抗先造谣中伤，以所谓“组织不纯、分子复杂、思想分歧”为借口，勒令停止活动。与此同时，当日军准备横越十万大山攻占南宁的时候，南路的合浦县抗先队也被取缔。

一九三九年秋天，国民党广东当局扼杀抗先的逆流逐步推向全省各地。在中山，妇协被取缔，接着，又强行收缴抗先的武器，取缔抗先组织。不久，设在新兴县的抗先西南办事处和郁南县抗先也被强行解散。此后，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对抗先和其他进步抗日组织的压制、迫害越来越严重。在东江一带，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二十三位同志（其中一部分是抗先队员）。只是由于党组织和抗先总队部及华侨方面进步抗日组织的多方营救，这些同志才免受其害。在罗定县，他们封闭了由我党通过抗先开办的“西江大众社”和“汇合”书店。同时还解散了好些青年抗日团体。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再次暴露了官僚、买办、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

在党的教育下，抗先的同志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在日伪顽夹攻的困境中，他们没有被吓倒。他们仍然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奔走呼喊、艰苦工作、勇敢战斗，同时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这期间，抗先总队部的成员稍有调整，抗先总队长仍然是邓明达，副总队长陈恩，秘书长黄泽成，组织部长唐健，宣传部长温盛湘，副部长张江明，秘书处处长陈嘉（杜襟南）。抗先总队部同国民党当局有过两次较大的斗争。第一次斗争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那时国民党当局对抗先与我们党的关系已早有觉察，为了获取操纵抗先的领导权，他们提出抗先总队部的同志都要加入国民党。总队部则以“参党自由不能强迫”为由进行抵制。省委经过周密考虑，为了掩护工作，决定布置个别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他党员不参加，

表面上参加了国民党的同志，实际上还是作我们党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抗先总队部一直与各地抗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按照党的部署开展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我们党通过抗先的活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省委考虑到抗先可能会被国民党解散，须预作准备，指出抗先队员可以和群众一起建立读书会、兄弟会、姐妹会、学生会等等，以便保存组织力量。抗先总队部与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后，那时，国民党当局正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手段来压制革命青年组织。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提出以“三青团”统一全国青年组织。广东国民党当局也相继在各地建立“三青团”，妄图统制、包办全省的青年运动。他们首先强迫抗先总队部的全体同志集体参加“三青团”，并要求抗先总队部发表宣言，号召全省抗先队员都参加“三青团”。抗先总队部党组织向省委请示。省委指出，“三青团”如果作为一个抗日的青年团体出现，抗先是可以和它建立统一战线的，但国民党当局别有用心，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要解散抗先，我们坚决反对，毫不退让，拒绝发表号召全省抗先参加三青团的宣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韶关召开的第二次全省青年工作会议也一致表示拥护省委的决定，坚决拒绝参加三青团，坚持抗先这面光荣的旗帜。估计到反动派会对抗先残酷迫害，会议还决定做好应变的准备，使广东的青年运动能在更困难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一九四〇年四月，广东国民党当局要抗先总队部负责人到国民党省党部作最后一次谈判，强迫接受他们的意见。当时省委组织部长亲自和省青委书记吴华、抗先总队部陈恩、黄汉成、唐健等同志开会部署，由陈恩等同志作为抗先的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到了延安开会）。省委要求谈判代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参加“三青团”只能自愿。谈判代表有的用硬的方式出现，有的可采取软的方式，要准备被捕，在坐牢时要坚持革命气节。省委派了一名组织干事同抗先总队部保持秘密联系，随时向省委汇报。在谈判会上，抗先代表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恐吓威胁，横眉冷对，据理力争，毫不妥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高信气势汹汹地拍台大骂，指责抗先不服从领导，如果不参加“三青团”，就要宣布解散抗

先。抗先的谈判代表说明各个青年团体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群众基础，不应只容许一个青年团体存在，统制青年，解散其他青年团体，这会削弱青年运动，不利于团结、抗战。

这次谈判以后，由吴华召开省青委会议，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分析在青年运动中同国民党斗争的形势，研究广东青年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估计到国民党必然要解散抗先，我们必须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去深入开展青年运动。会议决定用抗先总队部名义发表宣言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为各级队部被解散告社会人士书》，揭露国民党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用强蛮手段解散青年抗日团体，强迫抗先队员离境，暗中跟踪、非法逮捕的恶劣行径，指出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抗日团结，削弱抗日力量，只有利于日寇和汉奸，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犯罪。在《告社会人士书》中明确表示：对解散抗先，“绝对不能接受。”“这非但毫无补益于统一广东青年运动，反而只会破坏广东青年的团结。”“只有迅速消灭一切压抑解散青年团体的无理事件，爱护青年，信任青年，发展青年运动，加强民众运动，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全国团结，不断求取上进”，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会议还决定省青委代省委起草一个关于深入开展青年运动的党内文件，指出在政治上要同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作斗争；在组织上要实行转变，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利用各种合法组织，深入青年群众，进行团结、组织、教育工作；在思想上要坚定，不要有任何动摇，应保持沉着镇静；在行动上要埋头苦干，扎扎实实的做工作。

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党宣布解散抗先，接着又准备逮捕总队部全体工作人员，并以“非常手段”对付一些主要负责人。由于省委事先得到情报，做了部署、转移，这些同志才安全脱险。

根据党的指示，抗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了大的转变，转移到新的团体、新的组织中去开展工作；并且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一些合法组织，以至秘密参加到国民党中去，隐蔽自己、积聚力量，坚持斗争。

抗先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〇年四月被国民党当局非法取缔，历时共两年四个月，它的战斗历程，写下了广东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抗先队员在严酷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党从他们当中发展

了一大批党员，先后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工作的干部，有的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切怀念的。抗先的革命实践表明，在中国革命中，革命青年只有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茁壮成长，勇往直前。

〔注〕文中引用的抗先队歌是1938年用苏联一首歌曲的曲谱填的词，1939年，黄书光（王政）同志又另写了歌词，与吴华同志定稿后，一起从广东带到延安，请洗星海同志谱曲，然后由吴华带回广东，于1939年春，开始作为抗先队的正式队

歌传唱。这首歌词的全文是：“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旁。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为收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仗。看！同志们！铁的队伍散布在乡村，埋伏在森林，前后夹攻叫敌人永远不能再前进。打击它，消耗它，最后消灭它。看！同志们！挥动大刀拿起土炮准备反攻！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刘斯奋、陈志杰根据座谈回忆材料整理，吴华、梁嘉、卢德耀、杜襟南等同志对初稿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这里是摘要，全文登于《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 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着高等学校教材改革问题，探讨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讨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民族特点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问题。

代表们认为，文艺理论不仅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程，而且也应该是有志于文艺创作的人们的必修课。它应负有培养青年一代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趣味，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的责任，在普及文学基础知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方面也应有较大的贡献。

一些代表说，大学文艺理论教材虽然年年编、年年变，但总的说还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被认为较好的教材也只是从方法论角度着眼，将哲学的反映论简单地运用于文艺理论研究，以极大的篇幅强调社会对文学的外部制约，而忽视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作用，忽视文学内部规律的阐述，尤其忽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创作个性，忽视作家对作品的主导性影响。因此，应该把眼光向着文学创作内部规律，实现以创作论为主，论述文艺的构成及其特点，作家的创作准备与过程，作家的主观个性（如立场思想、文化素养、心理特征）对创作的影响。

代表们认为新的教材要具备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民主性与稳定性。它的编写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生活实际和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大胆探索艺术内部规律，详细阐述诸如个性、想象、才能、灵感、技巧等过去不敢接触的问题，尽量吸收我国古代文论的优秀成果，并反映出我们这一代研究的最新成果。

（梁东方）